

多维视野中的 文化理论

· 庄锡昌 顾晓鸣 顾云深等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池长亮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等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280 000

1987年10月第 1 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 000

*

统一书号：3103·276

定 价： 2.10 元

《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庄锡昌（常务） 金重远 庞卓桓 迟 柯

祝 明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

文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使比较的对象力求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 写于北京

序

田汝康

当前“文化”一词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内容：

一、指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实际指的就是思想史。

二、指与物质文明相对的精神文明——简言之也就是教养问题，包括了语言、社会风气、道德规范等。

三、指区别于经济、科技、教育的文化艺术活动。

这三种内容常常被重叠交互使用。

本书所选择的文章虽包括了上述三种内容，却不老与上述活动有关。因为它们都是从文化学的观点出发，把文化当成一个科学术语——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的术语，来加以剖析的。

不过，麻烦的是，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1920年以前只有六个不同的定义，而在1952年便已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个。为了使读者对本书内容有一个简单概念，我们不得不用一个简单的工作定义来进行概括。这样的定义可能很不成熟，但便于思考和讨论，一个尽管有缺点的定义，总比没有定义要好。

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者泰勒在1871年曾将文化简单归纳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现在我们把它作为定义来使用，但

解释却完全不相同。

人有基本的欲求和需要，要生存，要种族得以绵延下去。因为有这种强迫的动力，人开始对自然产物进行加工，进而使人脱离野蛮蒙昧状态创造了文化。弗洛伊德认为，文化就象人的假肢、假牙、眼镜一样，是在人对自然进行斗争时为克服自身的缺点而创造的。比如，人的体力无法同狮虎搏斗，因而发明了弓箭；人奔跑赶不上许多野兽，因而驯服马来作乘骑。

文化的基础既源于人的基本需要，因而造成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家庭作为养育的基本单位，传统传授知识的制度，对于自然认识的局限性，把人力所不能防止和挽回的事情归之于神。所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属于文化的内容。现全世界约计有一千五百种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它的差异实质上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当前所谓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就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来说，那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能为本书所选择的纷繁内容理出一个头绪来。

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还有马小鹤、孙志民、余甦等同志。

1986年6月

导言：多维视野中的文化概念

顾晓鸣等

集合有关学者的论述片断，构成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读本，是近年来世界上盛行的做法。这不仅是具体的编书手段问题，它恰好反映了现代人科学观的深刻变化：一门学科，不再是定义和结论的集合，而是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其理论和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际研究的进展而处于永远的变动之中。在这动态过程中，曾经影响一时的观点还来不及成为永久的定义，新的见解便大有替代的趋势；而也正在这一推陈出新的进程中，科学的思考向着相反的两个时间向度不断朝纵深发展：人们在走向未来、提出前无先人的见解的同时，不断地回溯前人曾有过的哪怕是片言只语的观点，在现代科学所达到的高度上，从中发掘出可望发展成最新理论的思想胚芽。这样，在学科发展的任一瞬间，总是呈现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壮观。只有纵观学科史出现过的百家之言，横视世界各国的研究成果，在各种学术观点组成的动态网络之上，给以高屋建瓴的把握，才能摸清这门学科的基本脉络，具备这门学科视野，窥见其发展的趋势和可能的突破口。从另一方面说，科学发展的这种跨时空的特点，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陈旧理论和最新理论的简单两分法，一切在学科史上起过重大影响的见解，都有可能学科发展的某一个明天重新登上学科的前沿。于是，基

本理论的范围当然也就不能局限于今日为人们公认的那些观点，而要把一切曾经有过影响的学术成果。

人以群分。学者因为时代、民族、阶级、学科、个性等等的不同，各具独特的眼光和方法，这就影响到了他们的学术研究，使某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更呈纷繁。用当代的术语来讲，在一门学科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范式”，这些范式既有着相互间矛盾更嬗的关系，又相互补充，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之间的关系便是适例。

任何一门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正是在这纵向和横向的多维视野中呈现出来的；而这多维视野本身处于不断扩展和交替之中，因此，必须寻求一种适应于这种情况的编书手段，以便既把该学科的基本东西介绍给读者，又不至于用一种盲目的肯定语气实际上把自己的一家之言强加于人。

采用文选的形式来介绍“文化理论”，也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选文只要达到一定的涵盖面，哪怕粗疏了一点，但总能给读者一种较全面的视野；所选学者的论述，尽管因为文体和风格的不同而显得驳杂，但在很多时候，比编者武断地加以概述并纳入整齐的体例的做法，对读者的启发可能更强一些。

因此，本书采用不同学派、不同理论观点、不同分析角度的选文，使之结构成一种看待“文化”概念的多维视野。书名也就取——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但是，这样的做法本身是有缺点的，加上我们的阅读本来就有限，资料的来源和编纂的时间也有限，因此，很可能产生两个弊病：第一，以杂多代替了全面；第二，以貌似全面掩盖了编者的偏狭。

第一点引出了一个总体方法论的大问题：简单地把各种观

点摆出来，能否真正揭示文化理论的科学实质呢？换一句话说，多维视野虽有兼收并蓄的优点，但极易导向科学和价值的相对主义。在众多的范式之中，哪一个是为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预示着科学的未来趋势的范式呢？如果不把这一维视野突出出来，不处理好它同其他视野的关系，能否有完整意义上的多维视野呢？事实上，每一门学科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总存在着两类理论研究思路：一是突出一点，努力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另一是综合各家学说，试图在论述各种观点的相互关系中推进总的理论认识。这两方面的工作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从而在解决每一种视野的深度的同时，不断地调整各种视野之间的关系。

本书既收了国内外当代学者关于文化概念和理论方法论的综合性论述，以着重解决关于文化和文化学以及文化史研究的总体理论方法论问题，并注意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西方文化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些观点；亦选择文化研究历史上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每篇文章之前有简短的作者简介，以便读者在阅读“一斑”的时候，有一个粗略的“全豹”形象作为参照。选文多数选自己已有中译本的原著，俾使读者在需要时较易读到全书。同时，鉴于国内这方面的译本还较少，又直接翻译了一部分选文。限于时间、人力和水平，挂一漏万之处甚多，但不管怎样说，它们是原作者的论述原本的片断，至少可以成为读者阅读那些综述文化概念的文章时的提示，以加深对各学派和学者的认识。

至于第二点，也即防止编者选择的偏狭问题，这是一个看似很容易解决而实际上几乎总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各种选本几乎都以一种公允的形象，通过一种特有的结构，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在国内的文化理论选本中最为常见。因

此，我们在为本书取名为“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的同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向读者挑明这一点，并尽力作一些弥补。

弥补的办法之一，是向读者提供一个思考文化理论的逻辑框架。它是对选文所未能涉及的重要之点的补充，又为读者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一个参照物。

一、文化研究兴起的动因 和多维文化视野的产生

这几年在世界范围中出现了文化热，但仔细分析一下各种有关文化的论述，可以发现极其分明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在堪称“文化讨论和研究”的演讲和论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倾向。一种是以文化问题为旗帜，实际上为着解决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问題，文化讨论是政治和思想变革的一种舆论准备，或者表现为一种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建设的努力，文化研究成为思想建设和完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个倾向则是文化学性质的，是人类对自然和自己的认识史的发展的必然结果：近代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为此准备了方法论工具，而生物进化论的研究的下一步当然是人自身的问题。和达尔文同时代的、持进化论观点的泰勒，在本书选文中的一番言论，正是对此的写照。

这两种倾向是交织在一起的，前者是文化研究这门科学的社会动因，而后者为社会的文化变革和建设提供科学的眼光和方法。当然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同样是文化研究的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这样一来，不同国度掀起的“文化热”，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视野。这种视野由研究对象和目的对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作用而产生，同时又同所在国家整个理论背景有关。这在西

方近代文化研究发端中看得很清楚。英法文化人类学和德国文化哲学的理论分野，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得较早，殖民地开拓早具规模的英法，文化研究同对内资本主义建设和对外殖民统治的实际目的紧紧相连，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雄心勃勃，对自己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此，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注重实地研究，相信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又发展为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文化种族主义的观点，成为文化研究中一个比较进步的传统。今日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就是一个新进化论者，强调工艺因素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文化研究是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部分。而反映德国社会和科学特点的早期德国文化研究，具有不同于英法的文化哲学的倾向。西方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再度勃发，是同六十年代“反文化”现象有相当关系的。难以解决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使人们离开简单化的进化模式，求助于各种文化哲学的思考。文化实证研究和文化哲学的新的综合，既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社会趋同的体现，又是文化研究各种方法论互补的结果。^[5]

再以我国文化研究的几次高潮来说，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文化问题便是政治问题的一个代名词。二、三十年代大规模文化讨论的兴起，焦点集中在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上。由于这次文化讨论具有直接的政治目的，因此，虽有费文山等学者在国内倡导学科形态的“文化学”的研究，但终于仍偏重于思想论争，而文化的实地研究则由一批与这些讨论无多大瓜葛的学者在农村市镇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着。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传统来看，始终强调文化变革与生产关系变革的相关性，始终强调人（革命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新文化、改造旧文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类文化理论视野显然

同现实文化研究任务有密切的关联。倒过来说，整个中国社会自然科学水准的不高，实地研究力量的欠缺，都影响到文化学学科的建立。文化研究中的宏观倾向和批判倾向，仍作为一种特点保留在眼下的文化讨论之中。

另一方面，随着开放搞活、尊重知识和人才方针的实施，国外各种文化理论和思潮正在系统而大量地被译介进来，文化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在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科内在逻辑发展的自律性趋势，同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我国文化研究可望产生一种全新的范式。

因此，当我们面临丰富而庞杂的文化理论的时候，从分析各种理论产生的社会动因和科学动因着手，往往能够更容易地看清其间的关系，并更贴切地理解某一种著作、某一个学者和某一类理论。

以下我们主要就西方近代各种文化理论，提纲挈领地分析一下文化研究动因和视野的关系。

1.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文化问题的重视，人们开始注意研究离自己最近的时代的文化史，伏尔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被人们看作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端；另一方面，在古代和异族中寻找文化材料，以改革和复兴自身的文化。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注意、赞美和引进，日本和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注意、赞美和引进，等等，既是自身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近代世界范围交往扩大和文化接触增多的产物。这个社会动因直接引起人们对不同于本民族的另一种文化的注意，也从科学上悟到了“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或结构的存在。这就起了双重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推动了普遍性的、没有严格科学界定的文化研究；另一方面推动了对文化本身进行研究的“文

化学”的产生。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以看作近代文化学的史前著作，它的立论和体系的产生，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近代各国各民族文化在社会大变革大扩展的时期的频繁接触和强烈对比。正是由于这种普遍的历史动因，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文化研究主要偏重于观念、艺术、制度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对古代和异族的文化还谈不上冷静的科学研究，文化研究是一种广义的思想政治运动。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写的《文明论概略》便是如此。

2.与此同时，近代的欧洲殖民扩张活动，不断地把完全不同于当代各文明国家文化和古典文化的原始民族和部落的文化材料送到人们的面前，殖民统治的实际需要、宗主国学者收集文化资料的可能性，使学者可以按一定科学计划对一种文化实施从生活习俗到政治制度的全面调查，并如实发表成果。充足的经费和官方的支持，也大大激发了学者的科学兴趣，加上自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日趋保守，大量学者把注意力从对本社会文化研究转向相对来说无利害关系的殖民地原始文化的研究，大量人种学材料累积起来，这促使了文化人类学实地文化研究的成熟，产生了科学形态的文化理论。这也使得一些书房里的学者可以大量利用别人收集的资料作第二手分析，提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定律”来。本书所介绍的列维—布留尔便是以利用他人资料提出“原始思维互渗律”而著称。但也正由于这类研究的内在社会动因，由此产生的理论方法论不能不深刻地打下殖民主义偏见的烙印，而且所谓“完全外来者”的调查文化的方式并不能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反而可能掩盖一种更深刻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列维—布留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民族的思维的偏见，事实上损害了他的科学成果。许多批评意见指出他说的“原始思维”实际上存在于今日的西方文明社会，就是

一例。

3. 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稳定期后，日常生活和建设促使文化研究深入到各个更细微的领域。社会中一般民主增强，公共生活日益繁荣和复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多样化和新旧急剧更嬗的局面。各种亚文化的界线日益明显，文化价值和文化象征意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纷繁景象，个人创造文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印刷机械、广播电视、电影、音乐、广告、报刊书籍的飞速发展，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文化自然累积的状态，人工大量制造“文化”，复制“文化”，传播“文化”……，人自觉的文化创造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狭义文化艺术发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个人—文化—社会三者的关系成为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其间的具体关系，一系列分析性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了，这就是环绕象征符号、意义、价值、需要、文化情境、制度等而建立的种种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的社会学视野和心理学视野迅速扩展，两者相辅相成，日益揭示着文化的内在机理。卡西尔的文化理论从哲学的高度对此作了论述，而诸如索罗金、帕森斯等学者则从社会学角度试图建立个人—文化—社会的内在联系的各个具体环节，而诸如米德的象征互动论、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等理论，则沟通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对文化的心理内化机制作了深入的探索。至于麦独孤、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更通过对人的心理本能和无意识结构的分析，试图把文化还原于人的心理结构。这些工作构成西方现代社会管理和控制、教育和大众传播以及整个文化艺术事业的基础理论工作。

4. 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批判，对各种反文化思潮的理论分析，这是当代文化理论勃发的又一社会动因。许多学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看到了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危机，看到了现

代文明的消极方面，但他们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之，因此，形形色色的文化归因论出现了。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把各种文化看成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实体，用文化体本身的兴衰来解释历史、预测未来；有的学者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归结为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分离，从而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进行文化批判，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又一重大特征。一般正统的学者和学院内外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的文化批判同文化基础理论问题交织在一起，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性的见解，本书选用的丹尼尔·贝尔和马尔库塞的选文，或可见一斑。这种社会动因产生的研究视野，势必会带上特有的历史宿命论、文化和文化人至上论的色彩，尽管它们在寻幽探微剖析有关问题时不乏真知灼见。从另一个角度说，人们对现代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也折射为对传统甚至原始文化的向往，这也引出了大量的文化研究和与这种心理有关的观点。从个人角度来说，对文化的关注和反思，是使个人摆脱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的一种途径，是追求自身独特价值、争取文化创造力的一种表现。所谓“寻根热”、“现代人寻找灵魂”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点。这就使得眼下各种文化理论和著作带上现代的感情色彩。

5. 与以上简要归纳的社会动因相对应的是学科发展本身的动因。人对自身和社会的科学认识，是在自然科学方法的激励之下，逐步从哲学的玄思走向近代社会科学的，因此，近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对人类和社会的研究，往往简单地采用自然科学有关学科（生物学、机械学、自然心理学等）的模型，而忽视了人类社会自身的“人的特点”——人有“自由意志”，不同于物和非人动物；个人之间的差异极大；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一次性过程，人具有人生经验和历史经验的累积等等。随

着近代社会科学的日益成熟，这种“唯科学论”的自然主义研究的理论方法论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看到并尖锐地提出来了，而且一百多年前许多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明确地把这些“人的问题”放在科学的前沿上。提出生命哲学的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把社会和人文科学称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他强调社会生活的主观性和历史性，提出要通过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活动动机和文化符号来理解社会现象、事件和问题。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等人提出了关于“价值”的学说。他们的许多观点成为文化哲学的重要部分，成为二十世纪文化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一。因此，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文化”问题的提出，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的独特性质深刻认识的体现，是社会科学进一步科学化的重要环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研究的深入程度和实证化程度，将是社会科学达到严密化和精确化的标志。因此，今天几乎所有社会学科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文化研究——经济学日益注意到制度和文化的制约，语言学日益向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文化研究靠拢，连科学史家也日益注意到了自然科学范式受到所在文化的深刻制约。这种状况是现代“文化热”的重要科学动因，当然它也同有关学科和理论课题的现实社会需要是互为因果的。

二、学者和学派的学科背景

与文化理论的多维视野

人的一切科学活动总是在两方面受制于他的现实关系：他所处的社会格局、面临的社会问题，他本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这是他理论视野的社会动因。而这种动因要变为系统的学